

紅藍與猩猩

——中古時期紅色染料名稱小考

龔麗坤

傳統的植物染料中，被提及頻率最高，名稱最為複雜的，當數以紅藍為代表的紅色染料。紅藍應當是一種舶來品，中古時期，紅藍染一度成為中國最為流行的染紉方式。本文擬結合中古時期的傳世文獻，對敦煌及西域所發現的文書中有關紅色染料的詞彙做一辨析和考源，並試圖對附著於其上的傳說、審美趣味與社會信仰予以闡發。

1 紅藍

紅藍是中古時期最為知名，也是最為重要的紅色染劑，中古時主要有“藍”、“黃藍”、“紅花”等別稱。紅藍（*Carthamus tinctorius L.*）中主要含有兩種色素，一種是紅花素，可染紅，溶於鹼而不溶於酸，另一種則是黃色素，可染黃，溶於酸不溶於鹼¹。從染織工藝上來講，淘去其中的黃色素，可以保證其染紅的效果²。

1.1 紅藍的來源

紅藍最初的來歷很難確定，大部分學者認為其是西方舶來品。有關“紅藍”的記述，見於張華《博物志》與崔豹《古今注》，治紡織史者所常說的“《博物志》中載作‘胭脂法’”正是出於此處：

¹趙豐：《中國古代染色文化區域體系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89-102頁。近年來關於紅藍及其製品的研究，還可以參看王冬松：《“紅花”“胭脂”考——兼論唐代敦煌藝術中的紅色植物顏料》，《藝術探索》第27卷第3期，第26-29頁。以及楊建軍：《染料紅花古名辨析兼及番紅花名稱考》，《絲綢》第54卷，2017年2月，第73-81頁。

²日本自奈良時期開始，一直也有利用紅花的記錄。關於古代紅藍染織技術的發展，也可以參見日本的研究成果，如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絹文化財の世界——傳統文化・技術と保存科學》，角川學藝，2005年；小嶋真理子、齊藤昌子：《赤色天然染料のHPLCによるキャラクター化（II）——紅花、蘇芳と2つの染織文化財の赤色染料》，《文化財保存修復學會誌》第47卷，2003年，第21-35頁。

《太平御覽》引《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藍蔞（花），搗。以水洩去黃汁，作十餅如手掌，著濕草臥一宿，便陰乾。又《太平御覽》同卷所載崔豹《古今註》中有：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³。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燕支花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之紅藍矣⁴。

石聲漢在《試論我國從西域引入的植物與張騫的關係》中指出，上引兩條材料的最早來源均是《太平御覽》，並不見於成書時代更早的類書之中，這兩則材料是否為晉人撰作，尚有疑問⁵：《博物志》“取藍花作燕支”條不見於今本《博物志》，不確定是否為張華《博物志》中所出。而崔豹《古今註》中的材料較今本《古今注》而言更為可信⁶。清人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指出，紅藍於“《開寶本草》始著錄”⁷。而“紅花由張騫帶回”的傳說可能起源較晚，憑藉現有材料唯一能確定的是，在南北朝時期，紅藍在中國已經被作為經濟作物廣泛認識和種植了。關於其早期的種植情況，《南史·王洪範傳》中有：

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強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易，以祈利益。洪範至一皆斷之⁸。

紅藍成為最為當時人所熟悉的一種紅色染料，應當不晚於劉宋初年。《史記》中有“千畝卮茜”之語，在史記三家注中，《集解》引“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繪赤黃也”，《索隱》亦同⁹。此處所謂“茜”，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證據¹⁰，當為茜草（*Rubia Cordifolia L.*），是一種多年生的蔓草，其根可以作為染料，早在先秦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利用。茜草用明礬媒染劑可得紅色，用鐵或鉻鹽媒染劑，可得棕色，用銅媒染劑得紫紅色，錫鹽媒染劑為橙色¹¹。茜草的主要作用成分是根，主要的使用方法是將茜草收割後將根洗淨備用¹²。混淆茜草和紅藍的

³《北戶錄》中“花似蒲公英，出西方”一句作“花似蒲，云出西方”。鍾無末《北戶錄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第77頁。

⁴《太平御覽》，涵芬樓影印宋本，中華書局複製，1960年，第3186頁。

⁵石聲漢：《試論我國從西域引入的植物與張騫的關係》，《科學史集刊》，第五期，1963年，第24頁。

⁶馬縞《古今注》與崔豹《古今注》之辨，詳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40-749頁。

⁷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63頁。

⁸《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十，第1711頁。

⁹《史記》，點校本（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943頁。

¹⁰熊櫻菲、解玉林：《周一漢毛織品的染色工藝探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14卷第1期，2002年5月，第34-37頁；解玉林、熊櫻菲、陳元生、胡立宏、殷夢龍、陳仲良：《周一漢毛織品上紅色顏料主要成分的鑑定》，《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13卷第1期，2001年5月，第1-7頁。

¹¹彭正中、周玲玉：《合成材料：化學與應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2年，第3頁。

¹²孫雲嵩：《茜草：古代的紅色染料》，《絲綢》，2001年第11期，第20-22頁。

源頭在於《史記音義》的作者徐廣。徐廣為東晉末劉宋初時人，因此筆者認為，至少在公元 5 世紀起，紅藍已經成為了中國所種植最普遍紅色染劑。

自紅藍中提取紅花素方法，現存最早的詳細記載在《齊民要術》之中。到宋代時，中國使用紅花染色的技術已經相當完備了¹³。提取紅藍中紅色素的方法，《齊民要術》中是這樣描述的：

花出，欲日日乘涼摘取。不摘則乾。摘必須盡。留餘即合……

殺花法：摘取即確擣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更擣，以粟飯漿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絞去汁，即收取染紅勿棄也。絞訖，著瓮器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擣令均，於席上攤而曝乾，勝作餅。作餅者，不得乾，令花濕鬱也¹⁴。

由上文可知，在《齊民要術》中，紅藍精煉後的副產品被用作為紅色染料，即所謂“收取染紅勿棄也”。

而由《新唐書·地理志》¹⁵“土貢”一節，我們知道，紅藍是靈武、北海、漢中、德陽、唐安等地的土貢，《雲麓漫鈔》中亦引《服飾變古錄》有“燕脂，紂制，以紅藍汁凝而為之。官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之”¹⁶，前半段固然荒誕，但在唐時其為貢品，應當是較為可信的。此外，在敦煌文獻中，我們也可以檢得不少紅藍種植的材料。可以說，在唐以後，紅藍的種植在北方已經相當普遍了。

1.2 “藍”與“紅花”

上文提到，紅藍又稱“藍”、“紅花”、“黃藍”，“黃藍”一詞在中古文獻中較為少見¹⁷，筆者在文中主要討論的，主要是“藍”與“紅花”這兩個詞。

敦煌有不少關於紅藍種植、收穫與交易的文書，王克孝、劉進寶兩位先生已經做過詳細的整理。筆者檢核原卷後，認為敦煌漢文文書中，與“紅藍”相關的文書可以分為四類¹⁸：

¹³譚光萬：《中國古代植物染料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第11頁。

¹⁴《齊民要術校釋》，繆啓愉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第262-263頁。

¹⁵《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卷三十八至四十二，第993-1080頁。亦可參照《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作“紅花”。而在敦煌地志中，則沒有出現紅花。

¹⁶《雲麓漫鈔》，中華書局點校本，1996年，第126頁。

¹⁷“黃藍”，僅見於《雲麓漫鈔》引《博物志》中，上引書第126頁。

¹⁸帶*者為筆者補入，劉、黃二先生所未收之寫本。

類別	卷號
僅提到“藍”的文書	Дx.2168, S.10457, P.3396
	文書中提到“藍”，但不確定其與“紅藍”的關係： P.2706
僅提到“紅花”或“花”的文書	P.2863, P.3541, D.162v*, 大谷 3033*, P.2615*
直接提到“紅藍”的文書	入破曆、散施曆等中：S.6064, S.4782, P.6002, P.2552+P.2567
	倉曹會計牒中：P.3446v, P.2654, P.2763v

1.2.1 僅提到“藍”的文書

第一類即所謂的“納藍曆”。也是王克孝、劉進寶的論文所討論的核心問題，王克孝認為此處所謂的“藍”即指紅藍，這一觀點現在看來是正確的。不過，他並不能確定該寫本是“納藍曆”還是“種藍曆”。劉進寶在其研究基礎上，將該寫本定為“納藍曆”，並指出：納藍曆就是一種統計當地種植、繳納紅藍情況的文書。劉進寶認為，紅藍又細分為“粟田藍”和“瓜田藍”兩種，而“從粟田藍和瓜田藍的名稱推測，這些種藍人並不是完全種藍，而只是在粟田及瓜田的地邊上或田內空隙中種植，這種插種方式在西北農村是比較常見的”¹⁹。

不過，“藍”是否可以直接作為“紅藍”的略語，筆者認為仍然需要商榷。“藍”除了紅藍之外，亦是藍色染料藍草的代稱，即所謂“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之“藍”。《齊民要術》中專設《種藍》一章，這種藍是用於製備一種藍色染料“藍澱”的，即現在所謂的靛藍——“澄清，瀉去水，別作小坑，貯藍澱著坑中。候如強粥，還出囊中，藍澱成矣”²⁰，劉進寶文中所提到的“種藍十畝，敵穀田一畝”，亦是出自《種藍》一章，所指也應當是藍色染料。此法亦見於《天工開物》等書中，一直到 20 世紀，我國南方仍然廣泛種植有藍草。前文已經談到，紅藍中只含有紅花素和黃色素，不可能用於染藍。

那麼，納藍曆中的藍，應當指的是“紅藍”還是“藍草”呢？筆者認為應當是“紅藍”，首先，藍草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其用途不如紅藍廣泛，罕少用於榨油或食用，一般只用作染料。按照 Дx.2168 等文書的記載，敦煌種植“藍”的規模不小，但筆者目前從未在其他敦煌文書中找到敦煌有大規模進行藍染活動的記述，很難想像種植藍草的目的。此外，藍草多見種植於中國南方，中古時期的文獻中，未見有西

¹⁹王克孝：《Дx.2168 號寫本初探——以“藍”的考證為主》，《敦煌學輯刊》，1993 年第 2 期，第 15、26-30 頁。劉進寶：《唐五代敦煌種植“紅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八十三輯，2006 年，第 248-270 頁。Trombert, Eric. “Des fleurs rouges en galette.” *Journal asiatique* 285.2 (2005): 509-547. 童丕：《據敦煌寫本談紅藍花——植物的使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第 261-274 頁。

²⁰上引《齊民要術校釋》，第 270 頁。

北種植藍草的痕跡。而紅藍則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廣泛存在於敦煌文獻中，且在傳世文獻中，也有直接將紅藍稱作“藍”的（《太平御覽》引《博物志》“作燕支法”中有“取藍花搗，以水洮去黃汁”，《北戶錄》有“其紅不下藍花”）。因此，筆者認同Дх.2168中所指的“藍”應當是紅藍。

解決了敦煌是否有種藍情況的問題，還需要考慮第二種情況，即敦煌文書中是否存在著有關藍色染料的記述呢？筆者認為，P.2706中的“藍肆兩半”，指的就是一種的藍色染料。根據童丕的文章，我們可以明確一點，紅花（有可能是紅藍的精製品，詳細辨析見下）在敦煌文獻中都是按照重量計算，而紅藍（植物本身）則都是按照體積計算。此處的“藍”，不同於其他處的“紅藍”，也是按照重量來算，且數量十分少，應當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某種精製染料。在傳世文獻以及敦煌文書中，紅藍的精製品從未被稱作過“藍”，加之根據藝術史的分析，敦煌壁畫中所用的藍色顏料主要以青金石等礦物為主²¹。筆者可以推定，P.2706中的“藍”與“紫礦”等種種珍稀品並列，價值應當較為貴重，也有可能是從西方舶來的“金精”等礦物製成的。

綜上所述，敦煌的“藍”，如果是按照體積算，則指紅藍，如果是按照重量算，則指某種藍色染料。

1.2.2 直接提到“紅花”或“花”的文書

敦煌文獻中提到的“紅花”或“花”，大部分量較少，多數如P.2615、P.2863中那樣，僅有“紅花一斤”（僅有一例相反，P.2552+P.2567《蓮台寺諸家散施曆》中提到“紅花一百二十斤”），此處的紅花，相較於紅藍來說，計量的方式也從重量變為了體積，似乎看起來也珍貴得多，筆者認為這主要是跟紅花的製備方法有關。

中古時期文獻中，紅花加工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製作成紅花餅，一種則是《齊民要術》中的殺花法，該法最後的產物是乾紅花。這兩種產物均很難以體積來計算。趙豐結合對傳統染織技術的經驗，總結了紅花加工的過程，認為兩種處理方法類似，僅僅是最後的產物不同，具體步驟見下圖：（順序由左至右）

濕紅花	初淘 (水、搗、絞)	復淘 (酸浴、搗、絞)	發酵 (蒿覆、一夜)	曝乾攤曬 → 乾紅花 製餅(陰乾) → 紅花餅
-----	---------------	----------------	---------------	----------------------------

趙豐認為，在早期紡織染色的實踐中，紅花染料主要採用製備乾紅花或紅花餅時多餘的染液，因此，染色的質量不很高，因為還帶有黃色素，染出的成品也並非真紅。徐廣所謂“其花染繒赤黃也”也可以印證這一點。不過，從出土的織品以及文獻上來看，自唐以來，紅花染已經在較多的場合用上等的紅花素來完成了，中唐以

²¹王進玉、郭宏、李軍：《敦煌壁畫彩塑青金石顏料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74-86頁。

後，往往有讚美紅花所染可以奪朱之句，如白居易《紅線毯》謂“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

除了中國之外，上文已經提及，日本在奈良時代起就有了關於紅花染的記載。正倉院寶物中，也有部分使用了紅花染色²²。而在《延喜式》中，我們則可以對當時染色所需要的染料數量、種類有大致的了解。如《延喜式》第五卷中《年料供物》中有：

支子一石八斗。紅花廿六斤。酢八斗。簾四張。席二枚。兩面端帖三枚。
短帖一枚。綠端帖十枚。已上秋
冬料。春夏料亦如是。但為薄帖²³。

此外，紅花除了紅藍以外，在中古時期可能指代另一種植物，即藏紅花（*Crocus sativus* L.），亦稱番紅花。藏紅花是一種昂貴的舶來香料，也就是敦煌文書中所提到的鬱金香（鬱金花）²⁴。鬱金香主要是作為佛前供奉的香料使用，也可以染黃，但並不能用於染紅。有不少證據表明，鬱金香在中古時期即傳入中國²⁵。

有關紅藍與藏紅花的區別，最為重要的研究是羅孚（Bertold Laufer）在《中國伊朗編》（*Sino-Iranica*）中的論述²⁶。他認為，藏紅花即鬱金香（即波斯語中的“kurkum”或“karkam”，在阿拉伯中則為“zafarān”，這一詞也見於波斯文中），與薑黃（也稱作鬱金）、紅藍完全是不同的植物。羅孚在他的書中寫到“鬱金這個詞在當時人們的心理上起了作用，像胭脂一樣：胭脂（safflower）變成了任何化妝品或紅粉的名稱，“鬱金”（turmerio）也移用在任何產生同樣黃顏色的染料上。”同樣，我們討論的“紅花”一詞，亦是如此，其既可以指紅藍，也可以指紅花。關於鬱金香在歐洲、伊朗、印度以及中國的種植情況以及文化含義，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完備，其所敘述之部分，本文不再引述。

在吐蕃時期，鬱金香也是一種相當重要的香料。在《新唐書·吐蕃傳》中，講述唐蕃會盟時，有這樣的描述：

已歃血，鉢掣逋不敵。盟畢，以浮屠重為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²⁷。

²²中村力也：《紅花染めの用いられた正倉院染織品》，《正倉院紀要》第33卷，2011年，第17-29頁。

²³《交替式·弘仁式·延喜式前篇》（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37年，第107頁。

²⁴具體考證見余欣、翟旻昊：《中古中國的鬱金香與鬱金》，《復旦學報》，2014年第3期，第46-56頁。

²⁵見上引《中古中國的鬱金香與鬱金》文。

²⁶Laufer, Berthold.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1874-1934. Chicago: published by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 pp. 309-323. 中譯本：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33-149頁。

²⁷《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第6103頁。

這種鬱金水（《冊府元龜》中稱作鬱金呪水²⁸），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認為就是指藏紅花水²⁹，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則進一步指出³⁰，這種鬱金水是吐蕃人在佛前祝禱所常用的一種盟誓之水，也稱為金剛水，在與佛教相關的儀軌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羅孚在對鬱金香和紅藍進行辨析之後，認同藏紅花的梵文中常被稱作“kuṅkuma”或“jāguda”，而紅藍則被稱之為“kusumbha”³¹。這一點基本上被之後的所有研究者承認。

P.3230 號寫卷中，“鬱金香”一詞後注“茶矩麼”，這一音譯亦見於《本草綱目》中，這一點羅孚已經做過專文討論。而“jāguda”一詞，除了表示“藏紅花”以及“種藏紅花者”之外，也同樣可以指代漕矩託³²。羅孚認為藏文中“sha ka ma”（也是指藏紅花，即茶矩麼的對音）的來源正是梵語中的“jāguda”，不過為什麼使用“jāguma”這一形式，羅孚在文中則一筆帶過。他的主要觀點是，出於某些原因，“jāguma”結尾“-ma”可能參照了“kuṅkuma”³³。筆者認為，羅孚的說法沒有文獻的證據，檢核《金光明最勝王經》中“茶矩麼”一詞，該詞的“茶”在宮本中寫作“恭”。而“恭矩麼”則剛好可以與“kuṅkuma”對應³⁴。而目前所見到的藏紅花一詞，大部分寫成“gur gum”（“gur kum”/“kur kum”），即波斯文的“kurkum”或（“karkam”/“karkum”）。佛經中“紅花”的對譯也正是這個詞。在敦煌藏文文獻中，這一詞也出現在儀軌和醫書中。筆者目前找到了四處，列舉如下：

醫書：

① S.756³⁵：

kha ra ma mchis / kur kum dang ll kri gang rnyed pas bsku/::/（第 17 行）

²⁸《冊府元龜》中的描述更為詳細：“使鉢掣連讀誓文，則蕃中文字，使人譯之。讀訖，歃血，惟鉢掣連不預，以僧故也。盟畢，於佛像前作禮，使僧諷文以為誓約，鬱金呪水飲訖，引漢使焚香。”見《冊府元龜》，卷九八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11532-11533 頁。

²⁹Demiéville, Paul. *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52. p. 230.

³⁰Stein, Rolf Alfred. “Les serments des traités sino-tibétains (8^e-9^e siècles).” *T’oung Pao* (1988): 119-138.

³¹見 *Hobson-Jobson* 中 “Coosumba” 條。Yule, Henry and Burnell, Arthur Coke. *Hobson-Jobson: The Anglo-Indian Dictionary*. Wordsworth Editions, 1996. p. 779.

³²關於漕矩託的研究很多，作者參考的有：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 年。季羨林：《〈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954-957 頁。

³³Laufer, Berthold. “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17.4/5 (1916): 403-552.

³⁴“茶”可能為“恭”之訛字，為高田師所教正。而在《高麗藏》中，“茶”寫作“恭”，可能是在輾轉傳鈔中，漸漸由“恭”變為“茶”最後變為“茶”。《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七冊，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34 年，第 435 頁 a。《大藏經：高麗版》，第九冊，東國大學校，1967 年，第 1336 頁 a。

³⁵錄文和翻譯參考了以下兩部著作。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長卷〉譯注（上）》，《中國藏學》，2002 年第 2 期，第 33-46 頁。羅秉芬、黃布凡：《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lcIm rtsha”一詞不知何解，羅、黃二位先生作“lcum rtsha”（大黃）解，此即從之。

若沒有蔗糖，也可以用鬱金香和黃丹配藥塗抹。

rgya gur gu gum bsres ste zho re zhIb du bthags la (第 24 行)
將印度紅花與之混合後磨成粉末。

② P.t.127

(前略) de nas sha ser du pyad na /gdong gur kum dang lcIm rtsha (第 177 行)

chu/ sman ga phur gcig tshugs su btang/ (第 178 行)

若面有黃斑，則以鬱金花同大黃之水，摻入磨成粉的冰片後洗臉。

涉及吐蕃金剛杵 (phur pa) 儀軌的文獻：

③ IOL Tib J 557

badzra gir ti // sman gur kum:// (第 6 行)

金剛歌菩薩。其藥為鬱金香 (紅花)。

④ IOL Tib J 406

gur kum dang rdo rje 'di rnam gyis mchod do/ (第十七葉第 6 行)³⁶

供奉... (上略) 與鬱金香 (紅花) 等金剛 (物)。

此外，F.W.Thomas 認為 M.Tagh.b.i.002 (即 IOL Tib N 2270) 中可能提到了藏紅花，現在該簡牘的圖版已經通過 ID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公開，筆者檢核圖版之後，Thomas 所述之處字跡已經漫漶不清，無法確認³⁷。

在上述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是：S.756 中，有“rgya gur gu gum”一詞，為何要在紅花前強調“rgya gur” (印度)，其原因值得考量，須知印度並非藏紅花的產區，這一名稱很有可能並不指藏紅花。在 17 世紀藏文醫典《晶珠本草》(*Shel gong shel phreng*) 中，作者將“leb rgan rtsi” (即《翻譯名義大集》中紅藍的對應) 作為了一種印度紅花的名稱，並且稱其香氣不著，這樣的描述較為像紅藍而非鬱金香³⁸。

僅憑現在的資料，似乎看不出漢文文獻中的“紅花” / “花” 所指代的是鬱金香還是紅藍。大谷 3096 號文書中，記錄着“鬱金花壹分，上直錢陸拾文，次伍十文，下肆十文”。比較大谷 3033 號文書可知，其價格是胭脂的數倍之巨。結合鬱金香的價格與供奉紅花的頻率和數量來看，此處的“紅花”指紅藍精製品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考慮到鬱金香在佛教儀軌中的地位 (目前未見到紅藍花在佛教中的利用)，似乎與寺院的聯繫更為緊密。似乎很難說清楚，敦煌文獻中出現的“紅花/花”指代的到底是哪一種植物。

³⁶Cantwell, Cathy and Mayer, Robert.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on Phur pa from Dunhuang*,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8, pp. 205-210.

³⁷Thomas, Frederick William, ed.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ol. 2.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pp. 369-371.

³⁸《晶珠本草》(*Shel gong shel phreng*)，藏文排印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64-168 頁。

1.2.3 直接提到“紅藍”的文書

可以發現的是，敦煌文書中凡是提到“紅藍”二字之處，往往都是與“大麥、粟、豌豆、胡棗、黑豆、白麵”等經濟作物列在一處。高啓安認為王克孝“紅藍子用來食用或作油料在元代以後”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他舉了《雞肋篇》中的例子來說明：“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高啓安認為，紅藍與米、粟面等列在一起，是因為其主要用於榨取食物油。³⁹

P.2846 中有“麻兩碩捌斗付二梁戶壓油，迴廊上赤白用”。高啓安結合“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之紅藍矣”之語，認為“赤白”是指寺院用食用紅藍油作為繪畫調和原料，“是一種紅色的稱謂”，似不確。張小艷師指出，赤白應當是“赤土與白土的合稱，常用作顏料”。上赤白，應當是指古人彩繪多先用赤土、白土敷牆，作為底層，之後再用白“灰”塗飾⁴⁰。這一看法似乎更為合理。此外，筆者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檢得“赤白”一詞，Дх.02822 “諸匠”部中也列有“赤白”（與“木匠”、“塗匠”、“砌壘”等並舉），也可以印證張小艷師的觀點。⁴¹

1.3 胭脂

而紅色染料中相當著名的“胭脂”（或作“燕脂”，“燕支”，“煙支”，“煙芝”等⁴²）一詞，亦見於敦煌文獻中。筆者認為，胭脂是一種紅色色素的精製品。根據前引《太平御覽》、《北堂書鈔》、《齊民要術》等書，大致可以確定，胭脂在中古時期，主要是由紅藍所製成的。此外，也有用紫礦製成的胭脂。

1.3.1 漢文文獻中的胭脂

就敦煌和西域發現的古文書上而言，大谷文書 3033 號上有“□花煙支一兩，上直錢玖十文”。“花”字前面闕一字，無法判斷是什麼字。但是可以知道，當時市場上胭脂確實不便宜（雖然其價格遠低於鬱金香）。此處的“□花煙支”，筆者有兩種猜測，其一：紅花煙支，其二：山花煙支。

“山花煙支”一名，見於《北戶錄》：⁴³

山花燕支：山花，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抽穗長二三寸，作青白色，正月開，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為燕支粉，或

³⁹高啓安：《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34頁。

⁴⁰張小艷：《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論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5-307頁。

⁴¹孫繼民、宋坤：《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3頁。

⁴²關於“胭脂”的異寫，詳見張湧泉：《敦煌寫本異文釋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張湧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14頁。

⁴³鍾無末：《〈北戶錄〉研究》，第77頁。

持染絹帛，其紅不下藍花。

依據字面的意思，“山花”並非指“紅藍花”，而是指南方的一種野花，羅孚在《中國伊朗編》中認為其是“落葵”。

此外，歸義軍時期的書信 P.2992 《長興二年六月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致甘州順化可汗書》中有：

今遣內親從都頭價榮實等謝賀，輕信上好胭脂表玉壹團重捌斤、白綿綾五匹、安西縑兩匹、立機細縑拾捌匹、官布陸拾匹，已前物等，到垂檢容。

從中可見，胭脂和團玉一道，成為了歸義軍節度使與周邊政權交往時的禮品⁴⁴，應當是具有一定的價值。

1.3.2 rgya skegs/rgya skyegs/rgya skyed

在《翻譯名義大集》中，“胭脂”所對應的藏文是“rgya skyegs” (skt. lākṣā) 。而用“rgya skyegs”或者“skyegs”代指“胭脂”，直到較為晚近的藏文文獻中仍然出現。而“lākṣā”即是紫礦 (*Butea monosperma* L.)⁴⁵，亦作紫鉤。在敦煌，紫礦與紅藍是不同的，一個比較明確的證據是，P.2706 中出現了“紫礦一兩半”，證明在當時敦煌人的心目中，確實有“紫礦”的概念。

在敦煌文獻中，“rgya skegs”見於 P.t.1120 : sna dgu la leb rgan mth

on ja gong ljang ku [—] dmar po rgya skegs kha mthing ka rma las
bsgral sna cig kyang yug bcu drug bcu drug/ (第 11-12 行)

出赤色、寶藍、ja gong (?), 綠……胭脂，石青，黃，九色羅各十六匹。

1.3.3 rdmar rtsi

而在漢文偽經《善惡因果經》中，也提到了“著胭脂胡粉朱唇入寺者，今作赤嘴鳥”，藏譯本《善惡因果經》的對應為“dkar rtsi dang dmar rtsis byugs te lha khang du 'gro na bye'u se rur skye'o”⁴⁶，此處“dkar rtsi”與“dmar rtsi”，直譯分別是白色顏料和紅色顏料，代指著胡粉胭脂。但這一用法筆者目前未在吐蕃期的文獻中檢得。

1.3.4 leb rgan/le brgan

⁴⁴榮新江、朱麗雙：《從進貢到私易：10-11 世紀于闐玉東漸敦煌與中原》，《敦煌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90-200 頁。

⁴⁵《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6 年，第 1149 頁。

⁴⁶任小波：《〈善惡因果經〉對勘與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 年，第 41、53 頁。

“leb rgan”，又作“le brgan”。結合 *citra-lakṣaṇam* 的藏譯本⁴⁷和《翻譯名義集》來看，也表示紅色。“leb rgan rtsi”可以代指“紅藍” (skt.kusumbha)，在近代，該詞也有鴉片的意思。但“leb rgan rtsi”與“紅藍”的對應也有例外，Emmerick 指出，“le brgan rtsi”也被用來翻譯梵文中的紫礦“alaktaka” (lākṣā)⁴⁸。

“leb rgan”在敦煌文獻中出現了三次。

① P.t.1120：

sna dgu la leb rgan mthon ja gong ljang ku [—] dmar po rgya skegs kha mthing
ka rma las bsgral sna cig kyang yug bcu drug bcu drug/ (第 11-12 行)

出赤色、寶藍、ja gong (?), 綠... 胭脂, 石青, 黃, 九色羅各十六匹。

② P.t.1102⁴⁹：

shang hig tse dar leb rgan dum bo gcig/ do 'go la leb rgan dum bo gcig/
(B 第一行)

常黑子：紅絹一塊。杜五：紅羅一塊。

③ Or.15000/30 (M.Tagh.0508)⁵⁰:

gsas gyI m[chid] [(第 2 行)

das / / g.yar du thos ste gl[o] [— (第 3 行)

s spring bas g.yar du mjald de [— (第 4 行)

sag ti dang la leb rgan chel [— (第 5 行)

/ dbu thod rgyu ni spus mchi[-] (第 6 行)

bde dbu rmog brtsan mchis / (第 7 行)

...gsas 寄... 敬聞... 見面敬呈...sag ti 同紅羅... 此 dbu thod (王冠? 此處可能指某種頭飾) 材質優良... (謹祝) ... 權勢正隆。

可以知道，“leb rgan”和“rgya skegs”在敦煌文獻中的含義都是紅色。這兩者同時出現在 P.t.1120 的同一句話中，其意義應該是存在差別的，但是具體有什麼差別，現在還不清楚。

⁴⁷Laufer, Berthold. *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 2,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pp. 708-710.

⁴⁸Emmerick, Ronald Eric. “The Sanskrit text of the Siddhasā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4.1 (1971): 100-101.

⁴⁹該文書的介紹和人名對音見高田時雄師的論文中。高田時雄：《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1998 年，183-190 頁。不過，該文中將“leb rgan”擬作“生絹”，筆者此處擬作紅色。

⁵⁰圖版、錄文參考 (該目錄下編號為 84)：Takeuchi, Tsuguhito.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oyo Bunko and British Library, 1997-1998.

2 猩猩與麒麟

關於中古時期的紅色染料，衍生了許多傳說。其中最為奇特的，應當是“猩猩血”與“麒麟竭”。其首先被注意到，是在薛愛華的名著《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在這本著作中，他曾經專辟一節分別討論有關“猩猩血”與“麒麟竭”的傳說⁵¹。

“麒麟竭”一名見於敦煌文書之中，P.3930中有“又方麒麟竭，有黑斑，塗之三五遍亦差”⁵²。由《本草綱目》，可知麒麟竭就是紫礦，但這一名稱具體的來源不詳。不過，波斯和印度的傳說中都有類似的傳說。在波斯的傳說中，紫礦被稱作“西雅烏斯(Siyāvush)之血”，來自於《列王記》(*Šāhnāmah*)中波斯英雄西雅烏斯之死的故事⁵³而在摩訶婆羅多中，也反復出現“puṣpita iva kiṃśukaḥ”（血落如紫礦）類似的描寫⁵⁴。

猩猩血的情況則複雜得多。“猩猩血”的真相究竟為何？薛愛華卻並沒有做出定論。他以為“與霜、露相比較而言，猩猩血這種染料的存在是少有多少有真實性的，或者更為確切地說，這種染料既有虛構的成分，但又有真實混合成分”。裴炎的《猩猩銘並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罽，色鮮不黯。或曰：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⁵⁵。

類似傳說更為早期的材料出現在《華陽國志》中，即“(哀牢有)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⁵⁶。猩猩作為一種傳說中的動物為人知曉，流傳最廣的恐怕是《禮記》中“猩猩能言，不離走獸”，有關於猩猩能言的傳說，一直被繼承了下來，譬如《博物志》中說，“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⁵⁷。至於“猩猩血”，在文學作品和中古時代編撰的類書中，也可以覓得很多痕跡。按照這些材料的線索考慮，可以發現，雖然在中古以後這個傳說仍然因為文本流傳的緣故的增加和遞變，卻已經定型。在諸多的文學作品中，它虛化成了一個帶有異域化的文學辭藻，而在另一個方面代表著極致“真紅”正色，存留在種種色譜之中。不過，無論是在何種意義上，這些作品的作者都對猩猩血的本質缺乏興趣。猩猩血究竟是什麼，它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染料嗎，

⁵¹薛愛華：《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456頁-458頁

⁵²叢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06頁。

⁵³Yarshater, Esh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51. 《王書》，黑柳恒男譯，東洋文庫，1969年，第420頁。

⁵⁴根據海德堡大學提供的《摩訶婆羅多》電子文檔的檢索，一共有33處。<http://kjc-sv013.kjc.uni-heidelberg.de/dcs/index.php>

⁵⁵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冊，第一六八卷，第754頁。

⁵⁶常璩：《華陽國志》，北京：中華書局，第一冊，第四卷，第54頁。

⁵⁷《博物志校證》，范寧校證，北京：中華書局，第三卷，第36頁。

它的本質是何物？在清以前，似乎未曾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疑問。

關於“猩猩血”這一意象在文學作品和類書中的應用，我們也許可以從中清理出一些線索，因此先將他們簡要分類列在此處：

首先是白居易《感興二首》中有：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⁵⁸。

也見他所做的另一首詩《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為三十韻以和之》⁵⁹：“猩猩凝血點，瑟瑟蹙金匡。”

中唐以後，“猩猩血”作為一個顏色詞使用的例子逐漸多了起來。類似的詠物詩歌還有皮日休所作的《重題薔薇》：

濃似猩猩初染素，輕於燕燕欲凌空。可憐細麗難勝日，照得深紅作淺紅⁶⁰。

而在染織史的編撰中被引用最多的即是這首李中的《紅花》⁶¹：

紅花顏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染出輕羅莫相貴，古人崇儉誠奢華。

這首五代時期的作品，其行文中似乎已經將“猩猩血”當作了一種名貴的可以染出“真紅”染料，而與此相對比，紅花則是某種更為便宜的染料，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此外，在與此相近的九世紀，又有一種傾向，即用猩猩血代指各種正紅色的花卉，並且與其他象徵著異物色彩的顏色詞連用，這一點在上文中已經提到，又如晚唐詩人方干的詩中所描述的：

瑟瑟林排全巷竹，猩猩血染半園花⁶²。

將猩猩血作為衡量花卉色譜的詞彙，在《全芳備祖》中更為常見。《全芳備祖》是宋代的一部植物著錄，收集了涉及書中每一種植物的“事實、賦詠、樂府”，有不少今已不傳的佚文。這種著作模式，在涉及到藥物的本草書外另立一門，也是後來《群芳譜》一類著作的藍本。此書刻印之後流傳不廣，除抄本之外，僅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的宋刻本殘卷，1982年由農業出版社補綴以國內所藏抄本影印出版⁶³。

“猩猩血”被代指為正紅色的花卉，茲舉一例：

枝上猩猩血未晞，樽前紅袖翠成圍。應須直到三更看，畫燭如椽為發揮⁶⁴。

而關於猩猩血染色的實例，則只有一條被收錄於《新雕皇朝類苑》中的，即關於宋太祖的軼聞：

⁵⁸ 《白居易集箋校》，朱金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74頁。

⁵⁹ 《白居易集箋校》，朱金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11頁。

⁶⁰ 陸龜蒙、皮日休《松陵集》，北京：中國書店，1993年影印本，第六卷，第13頁a。

⁶¹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七四九，第8529頁。

⁶²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六百五十，第7463頁。

⁶³ 梁家勉：《梁家勉農史論文集》，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第510-512頁。

⁶⁴ 《中國農學珍本叢刊：全芳備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七卷。

其血可以染紬素，尤為絕好。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類。

在這一種故事中，猩猩的形象並非類猴，而是“如雄鴨而大”。就染料本身的特性而言，其不僅僅可以用來染紬，也用於染絲綢。宋太祖平南漢事在宋、南漢大寶十四年（971年）⁶⁵。其求得猩猩是否僅僅為了染色，而其目的是否與有宋一朝德運屬火尚赤相關，則並沒有進一步的證據可供發覆⁶⁶。而且，猩猩血的來源從裴炎“西國”又重新回歸到了《華陽國志》所述的哀牢，這一點也值得注意。哀牢國產猩猩，除了上文中引述到的，在中古時期的史料中，最為典型的就《通典》中所述的：

（哀牢）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⁶⁷。

此外，猩猩血還有別的使用。在《西陽雜俎》中可以見到這樣的材料：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⁶⁸。

猩猩與狒狒的區分，前人的著作中有所論述，在此並不做詳細的考察⁶⁹。值得注意的是，在段成式的敘述中，“猩猩血”除了作為染料之外又有了一種新的功能，即通神。這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和“猩猩知往”⁷⁰的特性相關，另一方面則可能跟猩猩與中國古代的赤色崇拜有關。不過，這種特性在中古以後鮮有文獻提及，不過卻留存在了李時珍編《本草綱目》中：

（狒狒）髮極長，可為頭髮，血堪染靴及緋，飲之使人見鬼也。帝乃命工圖之⁷¹。

最後，對猩猩血性質的懷疑，是從康熙年間才開始的。揆敘在《隙光亭雜識》中曾道：

⁶⁵ 梁廷楠：《南漢書》，林梓宗點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卷五至卷六，第25-27頁。

⁶⁶ 關於宋代的德運問題，現在已經發表的研究有劉復生：《宋朝“火運”論略——兼談“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歷史研究》，1997年03期，第92-107頁。

⁶⁷ 《通典》，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一百八十七，第5061頁。

⁶⁸ 段成式：《西陽雜俎》，方南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1頁。

⁶⁹ 關於猩猩和狒狒的區別，高羅佩在他的名著長臂猿考中有著更為詳細的論述，猩猩和狒狒在文獻中有一些共通點，譬如它們都是一種能言的生物，長相類似於人，生活在西南部的未被開化山區里等，他認為在漢代之後，“猩猩”、“狒狒”和“狒家”這三個詞已經變成了一種給文章增添異域色彩的詞彙，具體可以見 van Gulik, Robert Hans. *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 Brill Archive, 1967. pp.27-29. 承襲上述的觀點，因此筆者在行文中對猩猩和狒狒并不做嚴格的區分。

⁷⁰ 段成式：《西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1頁。

⁷¹ 劉衡如、劉山永、錢超塵、鄭金生編：《〈本草綱目〉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下冊，第1910頁。

猩猩羶，或謂以猩猩血染成得名，非也。余詢西洋人，云：“彼中有一種紅果，味甘可食用，其汁染罽作大紅色，雖水漬泥污，永久不渝。”此土所製者，反是。真偽之辨可以證知矣⁷²。

因此，如果猩猩血真實存在，那麼它應該與紅花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再來審視文章開頭所引述的《猩猩銘》中的史料：

取其血染毛罽，色鮮不黯。

這可能是暗示著中古時期染織工藝的進步，前文已經提及，唐以降，紅花染色已經在較多的場合用上等的紅花素來完成，因而染紅的質量也大為提升。

在另外一方面，關於胡商假托傳說之名製售假貨的事例也並非孤證。《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就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在西域傳來的奇珍物品中，有一些商品的名稱並不是音譯或者對其性狀的描述，而是混雜了一些傳說，因而出現了很多類似于甘露蜜（真甘露）、胡桐淚、波斯棗（棗椰樹、千年棗、无漏）、獅子糞⁷³（實為蘇合，梵文中 rasamala 是糞便之意，而南島語系中的很多語言用這一詞彙代指蘇合，因此被作為了蘇合的名稱）之類的詞彙。這些名稱的構成很有可能是與“猩猩血”同類的。這可能是因為，在中古時代，隨著胡商貿易的頻繁，外來物品大量地進入了中土的日常生活中。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通過誇張商品的性能，給商品製造傳說來作為銷售手段的⁷⁴。

“猩猩血”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生成的——商人們銷售自己的紅花（胭脂）所編造或者聽聞的傳說。我們知道，在化學染料使用之前，能輕便染色，永久不褪色的紅色顏料並不存在。使用紅花染色，確實比之前常使用的茜草要便利。而隨著紅花染技術的改進，紅花素的提純，其所染出的紅色也確實更為亮麗。這可能正是紅花作為一種新興染料流行開來的要素。而據趙豐的研究，紅花也確實是在西北地區使用最為廣泛⁷⁵。這似乎也可以說明，紅花逐漸普及可能正是受西域影響。事實上，

⁷²揆敘：《隙光亭雜識》，謙牧堂藏版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一一四六·子部·雜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第24頁，原書第47葉b。關於康熙年間的這種博物風氣，謝國楨在《江浙訪書錄》中有這樣的描述：“清康熙時王士禎漁洋以能詩聞於時，而喜為說部之書，談詩論文以揚風雅為宗，所以粉飾清康熙之太平，當時文士靡然景從，成為風氣，若汪琬之著有《說鈴》，納蘭容若著有《淥水亭雜識》、以及揆敘著有是書，即是一個例子。著者均以貴介子弟，而自命為通人，見聞博洽，而以學貫古今，長於考訂自居”，詳見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90頁。

⁷³薛愛華：《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94頁、第270頁、第403頁至第404頁。

⁷⁴關於這一問題，承襲了薛愛華的思路，已經有專文討論，即陳明：《“商胡輒自誇”：中古胡商的藥材貿易與作偽》，《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4-26頁。在本文中，他也討論到了胡商對外來商品誇大其辭編造傳說以求得高額利潤的問題。

⁷⁵趙豐：《中國古代染色文化區域體系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01期。此外，關於焉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早期的文獻中，猩猩是一種在西南部的傳說生物，而在猩猩血的傳說中，它被描述成了“西國”傳來的，這種錯位也給我們一種提示。

綜上所述，我認為“猩猩血”可能正是指紅花所製成的染料。由於從西域傳入的紅花在染色上引起了一些新的變動，這種西方來的染料被染上了傳說的色彩。但隨著實踐中對紅藍製品的逐漸熟悉，人們便不再會認為紅花染料是猩猩血。但是猩猩血這個傳說卻作為一個“真紅”的象徵流傳開了。正應薛愛華所述：

“外來物品的生命在這些文字描述的資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續，形成了一種理想化了的形象，有時甚至當這些物品的物質形體消失之后也同樣是如此。體現在文字中描述的外來物品，最終也就成了一種柏拉圖式的實體。我們知道，外來物品在最初進入文化落后的唐朝邊境地區時，是很少具有這種理想化的形象的，他們在傳播的過程中實現了理想化的形象，但是同時也失去了在原產地的大多數特性⁷⁶。”

不過，還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在上述所舉的獅子糞、無漏等一些“商胡輒自誇”的譯名中，其外來語的成份是清晰可見的，而“猩猩血”一詞卻很難找到外來傳說中的源頭。薛愛華的嘗試并不成功，筆者也很難找到同一時代的外來傳說中與猩猩血相關的證據。因此，猩猩血可能未必是一個源自外來語的傳說。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支山在西域的考證，還可以參考藤田豐八的《焉支與祁連》（藤田豐八的《焉支と祁連》，《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6年，第757-776頁。）一文，此文也涉及到對紅花傳入的考證，其所用的材料與前引石聲漢文相類，故不贅，不過藤田氏以為紅花在西北的流行遙在張騫出使之前。

⁷⁶薛愛華：《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4頁。